

经济史论从(三)

缪坤和◎主 编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经济史论丛 (三)

主 编 缪坤和

副主编 何伟福 常明明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史论丛. 3/ 缪坤和主编.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5017 - 8820 - 0

I. 经… II. 缪… III. 经济史 - 中国 - 文集 IV. F1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299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组稿编辑: 刘一玲

责任编辑: 霍宏涛

电 话: 010 - 68359417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白长江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潮河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125 字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820 - 0/F · 7788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 电话: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41878

目 录

上 篇

中国传统社会富民思想探析

——立足于宋代的考察 杨华星 (3)

宋代国家与商业的关系研究 冯 芸 (29)

宋代信用票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缪坤和 (88)

中 篇

近代云南商会研究

——以云南商务总会为主体的考察 刘鸿燕 (119)

个旧锡业早期工业化研究 (1889—1949) 徐丽珍 (188)

军阀控制下的贵州财政金融与经济

发展 (1911—1935) 蔡绍洪 顾胜华 (229)

下 篇

近代中越贸易研究 余发良 (263)

编后记 (317)

上 篇

经济史论丛（三）

中国传统社会富民思想探析

——立足于宋代的考察

杨华星*

我国传统社会经济为国家本位经济，在如何管理国家经济的问题上，存在着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之分。主张放任主义者，多是从法乎自然的物质观和尊重人性的前提出发，主张封建国家除了征收必要的赋税之外，不过多干涉农、工、商各业的人民谋生取材的途径，人民就会进行积极地经营；政府只须提供土地和其他有利于生产的便利条件并做些必要的劝导即可，所以孔子提出“因民之利而利之”的口号，并把它看做是“仁政”与“王道”的体现。主张干涉主义者则多要求国家尽可能多地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插手各方面的事务，并有意识地通过制订政策，应用政治、经济、军事手段，给社会经济活动以直接的影响，从而改变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更有利于封建社会的发展。^①富民思想要求统治者在经济生活中

* 杨华星，江西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史研究所副教授，贵州财经学院经济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研究。

① 在西汉后期的“盐铁会议”上，在传统社会中就国家经济管理的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的争论达到一个顶峰，会议的结果是一改西汉前期的经济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强势介入，这也影响到了中古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作为封建国家管理经济事物的方式或手段，放任主义与干涉主义又被并行不悖地统一起来，这种统一不仅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的交替实施，而且还表现为一种思想中对二者的兼收并蓄。

对百姓的求利行为进行保护,国家不与民争利,其实质是一种经济管理中的放任主义思想。

富民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时代的民本思想。从《尚书》、《周易》等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发觉中国思想在形成之初就十分重视养民之欲。富民思想是民本思想的派生物,是民本思想的体现,而民本思想的形成又是与传统的天道观与君权神授的思想相联系的。中国历代的君主们,他们一方面宣称君权神授,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另一方面又祈求上天来保住他们天子的位置,并一代代地相袭下去,唯恐激怒了上天。于是历代统治者不得不关心天意的托诸者——民的生计和温饱,从而打出爱民养民的旗帜,提出了富民的口号。^①

富民思想是我国历代思想家所普遍主张的,他们主观上是想使人们能普遍富裕。富民思想首先为儒家所正式倡导,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他的学生冉有问他卫国的下一步措施,孔子回答说“富之”。冉有再问富了以后的施政方针政策,孔子回答说“教之”^②。这里先富后教的对象都是普通的小民,这成为了后世所普遍遵循的治国之道。孔子提倡藏富于民,“利民而不与民争利”是孔子富民思想的体现。墨子把“民富国治”^③视为古代的理想社会,他认为只有通过强力劳

① 参见陶一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评述》,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论语·子路》。

③ 《墨子·辞过》。

动才可以使人们致富，“强必富，不强必贫”^①。孟子主张仁政，“仁政”的目标之一就是富民。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②，认为富民的条件是搞好农业生产和统治者行轻敛薄赋的政策。商鞅对于富民的态度比较复杂，虽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讲富民，如“民贫则力富”；但他又对民富怀有戒心，认为“力富则淫，淫则有虱”^③，这种情况的出现反而对国家不利，因此他主张“使民以食出”，使富民以粮食向国家换取官爵，认为这样才能使“农不偷，六虱无萌，邦国富而民治”^④。《管子》中对于富民思想有比较深入的论述，主张“府不积货”而“藏于民”^⑤，“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⑥。荀子提出富民主张，他说“不富无以养民情，……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⑦。他还指出：“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篚、实富库。筐篚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⑧

汉初的贾谊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提出了“牧之以道，务在

① 《墨子·非命下》。

② 《孟子·尽心上》。

③ 《商君书·弱民》。

④ 《商君书·弱民》。

⑤ 《管子·权修》。

⑥ 《管子·治国》。

⑦ 《荀子·大略》。

⑧ 《荀子·王制》。

安之”^①，这一主张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富安天下”^②的思想。他认为安民首要“富民”，“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③，而要做到富民，则要求第一要多生产，第二要节约消费以广积贮。《淮南子》也曾提出“安民足用”的思想，“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④，建议轻税积谷用民以时，改变贫富不均的状况。后汉王符由民本主义而论及富民的重要性，他说：“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所谓治国之日舒以长者，非谒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则民安静而力有余，故视日长”；又说：“孔子称庶则富之，既富则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下贫而上富者，谁也？”^⑤“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⑥魏晋时期的杜恕认为安民丰财乃是治国之本，并主张重农、节用、薄敛、恤民，“帝国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术，在乎丰财，丰财者务本而节用也”^⑦。晋武帝时期的傅玄认为：“天下足，则仁义之教可不令而行”，“民富则安，民贫则危。”^⑧魏晋后

① 贾谊：《新书·过秦下》。

② 贾谊：《论积粟疏》。

③ 贾谊：《论积粟疏》。

④ 《淮南子·诠方训》。

⑤ 《潜夫论·边议》第二十二。

⑥ 《潜夫论·务本》第二。

⑦ 《魏书·本传》。

⑧ 《晋书·傅玄传》。

期的袁淮以“民生”为治国的基本要务，认为富国的目的是解决民生问题，同时他还提出了富国的基本措施：“富国有八政：一曰俭以足用；二曰时以生利；三曰贵农贱商；四曰常民之业；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货均财；七曰抑谈说之士；八曰塞朋党之门。……知此八政者，国虽小而亡，不知此八政者，国虽大必亡”^①。唐代民生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贮仓备荒、救济民食制度的确立。杜佑在《通典》中说：“理财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实质上是重申儒家先富而后教的思想。同时，杜佑把轻税作为富民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轻税的关键在于把握人心的背向，因为敛财则民怨，民怨则失人心。

宋代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于经济生活、政治前途的不稳定感加强，贫富变得复杂无常；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取财于民的方式更为多种多样，宋代富民思想出现许多新特点。此时富民中“民”的构成与前代相比出现了新的变化，无论就思想的深度还是广度而言，都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庶民地主地位的上升以及工商业的增长，使得反映他们思想的“保富”理论得以形成和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土地兼并势力和财富势力的兴起和发展，不断地加剧社会矛盾，又使当时社会上的抑兼并思想有很大的市场。因此，在整个宋代思想界，主张保富的人有之，主张抑兼并的人有之，既要求保富又要求抑兼并的也有之，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中，由于部分人把保富与反对抑兼并思想结合起来，形成当时以“保富”作为理论基础的反对王安石摧抑兼并的政策。南宋时期的叶适则是保富理论的集大成者和代表性人物。

^① 袁淮：《袁子正书》。

二

讳言财利、重义轻利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传统思想强调财利必须严格遵守统治阶层的道德规范，社会上不同等级在财富的占有上和物质生活方面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北宋中期民贫国弱的局面日甚一日，引起广大的士大夫中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改革的呼声高涨，经济政策成为人们检讨的重要内容。解除传统观点对人们追求财富的束缚，发展社会经济和保护富人的利益，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因此，众多思想家对传统贵义贱利思想进行批判，提出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为保富思想扫清理论障碍。

李觏是宋代反对贵义贱利思想的代表。他提出了自己的利欲论观点，强调求利活动的合理性，利和义是统一的。李觏认为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是自然的，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而进行社会经济活动以求财利，是礼产生的基础，“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①。他强调：“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②他认为利欲是人的本心，言利是正常的，不准言利是“贱人之生，反人之情”^③，并公开否定了孟子的“何必言利”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偏激之言：“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进而王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

①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礼论第一》。

②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原文》。

③ 同注②。

所欲踰矩，非无欲也”^①。李觏认为利欲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也是礼产生的基础，人们为了解决衣食住行的需要进行各种社会生产活动，也导致各种礼义制度的产生，没有利欲这个前提条件，就没有礼的起源。他在这里把礼与利欲结合在一起，把利与义在内在关系方面统一起来。因此，重视经济发展成为了礼本身的内在要求，满足这种要求的求富活动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也就为保富打下了理论基础。

苏洵对传统的义利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有贵贱有尊卑有长幼，则人不相杀；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蚕，则鸟兽与人不相食。”^②礼是为人的经济活动服务的，要想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在实行义的时候给人民以实际的好处，不能给人民好处的“徒义”是行不通的。他认为圣人是反对言“徒义”，而不是反对言利，义和利相结合，才是圣人之道，义要有利，利也要有义，“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③。这就是他义利相和的理论。

张载认为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在他看来，礼乐刑政和物质经济生活的关系，前者是形式，后者是内容。如果百姓丰衣足食，社会就会稳定，“欲生于不足，则民盗。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故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不见可欲，而盗必息矣”^④。苏轼认为应该听民自取利，国家不应过多地干涉。因此，国家要做到“简易为法，以清静为心”，这样就会上下俱富。

①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原文》。

② 苏洵：《嘉祐集》卷6《易论》。

③ 苏洵：《嘉祐集》卷9《利者义之和论》。

④ 张载：《张子全书》卷3《正蒙·有司篇第三》。

陈亮认为人有欲是与生俱来的,“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人们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这是由人性决定的,但是人的欲望得到满足的程度不同的。“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这是命所决定的。因此人有富贵贫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叶适给予传统的义利观以强有力的批判。他认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国,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义之虚语耳。”^①以义与利为实际内容,既以功利来定义道义,就不应该以义抑利,而应该以利和义,^②义和利是相互统一的。叶适把追求功利看成是人的一种本性,“就利远害是众人之同心”^③,因而对于人们的种种求利活动,只能顺应,不能人为抑制,“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则沮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来天下之争”^④。此所谓利即功利,内容当然并不限于物质财富,但是物质财富则必然成为功利的主要内容,从而也就肯定了物质财富的合理性。叶适又称财富为衣食之具。他说:“夫聚天下之人,则不可以无衣食之具。前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则伏而不见,或无节则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继,或共源虽在而浚导之无法,则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与天下之财与

①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三》。

②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魏志》。

③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尚书》。

④ 叶适:《水心别集·官法下》。

天下共理之，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也。”^①他认为衣食之具是每个人生存的前提和基础，他对人们为谋求衣食之具而“朝营暮逐，各竞其力，各私其求，虽危而终不惧”^②的情形表示肯定和理解，从而否定了圣贤不为利这一古老命题。既然如此，对于管理者来说，利之所在，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基础，而使百姓衣食富足的统治者“制土处民，富而教之，必世而后仁”^③，“夫衣食逸则知教，被服深则近雅”^④。他认为民富为治国之根本，“为国之道，在于得民”；而要得民，则须“养民、教民、治民”^⑤。又说：“国本者，民与？重民力与？厚民生与？惜民财与？本于民而后为国与？昔之言国本者，盖若是矣。”^⑥这一观点是孔子先富而后教观点的发展，也是对《管子》所说的“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合理思想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

三

既然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礼产生的前提条件。那么，宋代富人的财富来源是合理合法的，国家应该履行其干预经济的国家管理职能吗，这也是其时思想界保富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宋代思想家认为，国家干预经济活动本身与其身份不相符合，富者不一定是强者，富人的财

① 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下》。

② 叶适：《水心方集》卷10《留耕堂记》。

③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汉书二》。

④ 叶适：《水心文集》卷12《集丁少詹文集序》。

⑤ 叶适：《水心别集》卷2《国用上》。

⑥ 叶适：《水心别集》卷2《国本上》。

富是通过聪明才智、自己的努力与勤俭节约来实现的,农工商一事,都是获取财富的正当职业,因此富人的财富来源是合理的,这也成为政府要保护包括因商致富在内的富人阶层利益的重要原因。

李觏的保富思想是与他的抑末思想作为整体论述轻重之势而出现的。李觏认为抑兼并政策应与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认为当时抑末是应该的,这是加强中央财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国家实行平准平粿、赊贷等轻重政策来抑末,对于当时来说的确能做到使“蓄贾无所专利”^①,以达到“钳并兼”的目的。^②但是与前代不相同的是,李觏认为抑末并不是抑一切商人,他把商人划分为三个层次,上层是富而强者,即政治上享受特权,而且经济上财力雄厚的大商人和兼并势力;中层是富而不强者,即政治上没有特权,经济上比较富有的一般工商业者;下层是不富不强者,即人数最为众多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李觏认为抑末政策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那些大商人、大兼并势力和小手工业者。他反对大商人和大兼并势力凭借其掌握的特权对一般的商人包括富商进行侵夺和兼并。同时,他认为对于由无地而转化来的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国家要把他们驱回农业。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上这一部分人占有很大的比例,同时他们的活动又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对于封建国家来说是不利的。对于中间阶层的这一部分富人,李觏认为国家不但不能抑止,相反应该用政策来扶持,因为李觏认为国家的政策应该把“富”与“强”区别开来,富者并不就是强者。从事“耕桑”、“飭财”、“通货”的富人之所以能够发财

①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富国策第六》。

②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周礼致太平书·国用第十一》。

致富，是因为他们“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兴夜寐，攻苦食淡，以趣天时，听上令也”^①，国家对这些人进行打击是不合理的。李觏是主张抑兼并的，他站在中小地主的立场上，反对大地主、大商人凭借自身的特权对一般工商业者包括富商进行侵夺、兼并；同时，对无地而转化来的中小工商业者，李觏也要求把他们驱回本业；而对处于和中小地主类似的一般工商业者，李觏认为是要扶持和保护的对象，即认为他们是“安富”的对象。因此，李觏实际上是要求对处于和中小地主类似的中间地位的一般商人和富人给予保护和扶持，这就形成了他的独特保富思想。李觏反对封建统治者用“任之重，求之急，劳必于是，费必于是”^②的赋役来诛求勒索这些富而并不强的人，指出其结果是“天下皆贫”，不利于君主的统治。李觏呼吁政府应该保障一般工商业者和富人的利益，“平其徭役，不专取以安之”^③。李觏的这种安富思想，主要从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的角度出发，说明他一定程度上从商品经济发展的角度，从工商业者利益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且他赋予了轻重学说以新的内容。

司马光认为，人的贫富是人们自身材性的智愚不同决定的。富是勤劳、节约和远虑的结果，而贫则是懒惰和浪费所造成的。他认为：“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苦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赢余而不至狼狈也。贫者眚窳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赢余，急则取债于人，积不能偿，至于

① 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周礼致太平书·国用第十六》。

② 同注①。

③ 同注①。